

“假相”与真义——人类思想转折点上的科技镜像

陈慧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高科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暴露了人在认知上的天然局限性,也暴露了目前作为人文基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哲学缺陷,哲学研究的整体范式亟待突破。借用培根的“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说,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高科技观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无意识”的主体形而上学、缺乏反思的流行观念、难以突破的旧哲学等。从某种程度上说,高科技领域是哲学创新的突破口,科学技术带来的前沿问题是人类思想更新换代的契机。

关键词:高科技;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2)01-0010-07

工业革命以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并将进一步地改变人类的历史。今天,高科技带来的新问题已经超出人们所能理解的范围,人类认识事物的思维框架(或者说“视域”或“前见”)捉襟见肘。按照库恩的理论,“反常”与“危机”是思想更新换代的契机。但从目前来看,高科技带来的“反常”与“危机”与其说是认识的契机,不如说是认识的盲点。不仅如此,从陈旧的思维框架出发来排斥新事物的情形屡见不鲜,这表明,人类认识的天然局限性依然存在。借用培根的“四假相”说^①,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高科技观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无意识”的主体形而上学、缺乏反思的流行观念、难以突破的旧哲学等。这些“假相”既是思想创新的障碍,同时又具有反向启发的哲学意义。它提醒人们要遵循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真理,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创造新的哲学理念。无论如何,一味地坐井观天、墨守成规是愚蠢的,也是行之不远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高科技领域是哲学创新的突破口,科学技术带来的前沿问题是人类思想更新换代的契机。

一、种族假相: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

种族假相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类似,是人类认识问题时很难避免的主观局限。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增长,无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人类的视野都在不断扩大,人越来越认识到自身在宇宙中的渺小地位;另一方面,囿于人类固有的立场、利益、成见,人在认识事物时,又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为尺度,以人类为中

收稿日期:2012-02-02

作者简介:陈慧平(196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

① 培根在其代表作《新工具》的第一卷提出了“四假相”说。假相(idol),亦即盘踞在人们头脑中又很难被人察觉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阻碍人们正确认识自然、认识真理。根据错误的不同来源,培根将假相分为四类,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人类的主观印象和成见为尺度,从而使认识中掺杂着许多错误的成分。“洞穴假相”指的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认识局限性,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等的不同,很容易在认识上形成个人的“一孔之见”,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市场假相”指的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由于对名称和概念的规定和理解不当而产生的假相。由于这种假相执行的功能如同市场上的交换作用,虽然是假相,但不妨碍人们普遍接受甚至流行。“剧场假相”指的是从各式各样的哲学体系以及社会思潮中移植到人们心中的假相,如果误将哲学家精心制造的理论体系当成了现实,就会陷入“剧场假相”。

心,将人类摆到一个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从而陷入主观主义,歪曲了客观存在的真相。

对待高科技问题上的“种族假相”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以克隆技术为例,首先,人们认为这一技术“可能对人的尊严和价值构成了挑战。……人自身不被看作是目的,而沦落为一种工具,……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在1997年的决议中认为,‘克隆体必将构成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他将不再被视为一种目的而成为一种手段,我们不再称其为人,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供操作的物件’。世界医学协会也坚决反对克隆人计划,认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其次,人们认为,“克隆技术可能对社会观念造成极大的冲击。人类的生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一定的婚姻、家庭、宗教和性观念。如果用克隆技术繁殖后代,不需要两性关系参与,那么婚姻、家庭、宗教和性观念等势必发生变化。尤其是像在某些重视家庭、后代等问题的国度里,重建婚姻、家庭以及性观念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克隆人的地位也非常尴尬。假定一对夫妇使用丈夫的遗传物质克隆了一个小男孩,那么,这个妻子是这个小男孩的生身母亲吗?如果说是,小男孩并不带有她的遗传物质。而说不是,他确是她所生。对于丈夫来讲,小男孩是他儿子呢?还是另一个他自己?……另外,当克隆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时,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可能在心理上产生孤独感、恐惧感和绝望感,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再次,人们认为,“克隆技术可能带来进化的风险。基因的多样性是物种得以进化适应环境的源泉所在,人类传统生育方式保证了不同基因组之间重新组合的可能性。通过基因组的重新组合和变异产生出新的基因类型,为人类的进化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使人类得以在选择之下更加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要求。基因型的单一化在生物进化上是一种倒退,即使是被认为非常优秀的基因型也很难适应所有的环境。”总之,人不是上帝或女娲,应该限制克隆技术的发展。^[1]

每一种理由看似都有道理,都会引发人们对克隆技术的担忧与反对,但深入思考便会发现,每一个“确凿”的理由都根植于“种族假相”,都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出发的。

从克隆技术把人作为对象来看,如果说人、社会、科技都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如果说人产生以后自然界不会停止其进化的步伐,那么可以说,人的自然生命体成为可操作的对象也是自然界进化过程中的环节。从宇宙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正常的环节,谈不上触犯了人的尊严与价值,也并非什么大逆不道。换个角度说,如果不是先有了一个永恒的、高贵的主体形象,人也就不会感到尊严与价值受到了威胁。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永恒而高贵的主体形象是不变的、客观存在的,还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可以变化的自然产物?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难道不是“种族假相”的表现吗?认为克隆人的尊严受到侵犯,理由也并不充分。对于自然生育的人而言,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人的自由与尊严先天地残缺。如果没有种族假相在作怪,人们就不会对此避而不谈,只是以双重标准来讨论克隆人现象。

从克隆技术对家庭、婚姻等的冲击来看,如果制度、观念是实践的产物,实践发生了变化,制度、观念也将发生变化,那么,克隆技术对家庭、婚姻的冲击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冲击促成了变化,没有冲击,就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带来冲击的因素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因为它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观念与制度的重建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人类正是在知难而上的征途中显出其伟大的一面。新实践、新观念自然会产生新的适应性,以现在的观念忧虑未来是杞人忧天的无益行为。此外,人类的生殖目前还没有脱离动物生殖的特征。如果不被刻意美化,女人在生育时并没有多少尊严可言,相反,她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动物般的、无以复加的。神圣之说是诚实的形而上学的副产品,是种族假相制造出来的。

从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进化风险看,如果物种进化并非在人类的控制之下,那么基因的多样性与否同样不必完全呈现于人的理解中,进化有自身的路径,此一阶段的多样性并不排除彼一阶段的单一性。如果基因进化没有终极方式,人类传统生育方式肯定也不会是完美的终结点。科学研究表明,人类作为物种已经出现了某些退化特征。把“现在的人”固定化,按照固定的人的模式去忧虑未来,不仅是杞人忧天,而且会成为进化的阻碍。借口人不是上帝或女娲来否定人通过技术制造自己的可能性,这也是种族假相的表现。因为它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误区,固执于不变的人的形象,排斥变化与发展,注定不能客观地看待人自身。对永恒的

追求恰恰暴露了人取代上帝的企图,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而人类制造自己则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明,科技实践带动观念更新是历史的进步,而以陈旧的观念来束缚科技发展,则是僵化。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技术都曾经带来忧虑和否定的呼声,当首位试管婴儿于 1978 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人们已经能够平和地接受这一切了。

二、洞穴假相:“无意识”的主体形而上学

洞穴假相是由于个人的天性、所受教育等的不同而形成的个体性偏见,犹如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处的“洞穴”,人们认识事物时也难免其“洞穴特征”,亦即有“坐井观天”的一面。洞穴假相与种族假相类似,只是层次不同,所表达的都是主体形而上学的认识误区。种族假相会形成人类整体对认知错误的“无意识”,洞穴假相则会形成个体在认知上的“无意识”。由个体组成的集体,乃至集体所处的一个时代,也都有其“洞穴假相”。

洞穴假相来源于个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有知识上的,也有个体所处的时空位置造成的。从知识上来说,即使是理论家,也可能陷入洞穴假相之中,物理学家戴维斯举过一个例子:“1968 年,我曾参加了一次有关宇宙学的讲座。那次讲座对我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在即将结束演讲时,那位教授根据背景热辐射的发现这一事实,评估了大爆炸理论。‘一些理论家已开出了宇宙化学成分的清単,’他微笑了一下说道,‘这份清単的根据是大爆炸最初三分钟发生的核反应过程。’所有的听众哄然大笑。这给人一种印象,即试图描述宇宙刚诞生时的状态似乎是极其荒谬……现在看来,1968 年那次讲座结束时听众发出的哄笑显得是多么无知。”^[2]从个体的时空局限性而言,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是大量的“不变”和“等差级数的变化”。对按一定的比例翻番的等比级数变化,如计算机每过 18 个月,性能指标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人们缺乏体验和理理解。而真实的运动比等比级数的变化还难以把握,因为运动不是由一个个静止状态构成的,而是向前流淌的整体。从认知发展史看,大多数人所缺乏的是开放的流动性视角,洞穴假相因此往往产生一些非历史、非辩证的观念。比如,有人认为科技与人文的矛盾完全是人的观念造成的,是人们错误地选择了工业文明,人类回到工业文明前的社会,不要机器,也完全可以生存,而且能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返回大地的怀抱中耕耘求生。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自觉地陷入了洞穴假相,是非历史、非辩证的一厢情愿。

在对高科技的投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目前我们所倾力发展的高科技多是贵族科技,而不是适用于人类最大多数的平民科技。一些基础研究,像微观或渺观物理学领域,几乎看不出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什么特殊的益处,却耗资惊人。像旨在穷尽人类生命和意识奥秘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和脑计划,都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其利益竞争和弱肉强食的机制,才驱使整个计划疯狂地向前推进,以充分挖掘其一切物性潜能,实现其技术物化逻辑的一切可能性。这种观点并非绝无仅有,1969 年 7 月 21 日,《纽约时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人们对登月的不同反映。当时西方一些著名的人文学者纷纷发表意见:“我们技术和经济上的胜利恰恰显现了我们道德上的虚弱”,“难道东西比人更为重要吗?我实在无法相信类似登月这样的项目无法针对贫穷、战争、犯罪等等展开。”^[3]²¹⁰不假思索地看,这些充满道德感的观点似乎不乏说服力。实际上,它暴露出在高科技认识上的洞穴假相。

以个体的狭隘经验来衡量高科技的价值。从个体有限的生活经验看,一些基础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生活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益处。但是,如果突破个人封闭的视界,拉长思考的视野,将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流动的整体,即不难发现,正是没有特殊益处的科技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1650 年,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 30 岁左右,今天,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没有科技进步,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每个时代都排斥在当时看来无特殊益处的科学探索,人类恐怕只能停留在生产力低下的艰难求生状态。

从个体或集体的狭隘价值标准出发评判高科技的发展。把高科技的发展贴上贵族科技与平民科技的标

签,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主观主义。前苏联的科学研究曾被贴上阶级性的标签,被意识形态粗暴干涉,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停滞和倒退,对整个社会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无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发挥同样的规律,科学探索的机制也是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不能靠取消科技来实现,相反,它只能建立在科技所带动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

从既有的人道主义出发束缚对高科技的投资。将登月计划与救助贫困等相提并论是极为典型的洞穴观念。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时空条件是不断变化的,这也同样适用于人道主义。当今人类已进入太空探索的新时期,地球成了一个出发点,开发空间和探索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解除痛苦并不是生存的意义,人生并不是一个大医院……那些建议用向贫穷宣战代替空间项目的人应当扪心自问,形成宇航员品性的那些前提和价值观是否会满足于终身为人提尿壶或者为智障者教字母……贫民窟无法代替星星。”^{[3]213}探索未知也是一种人性,用一种停滞的人道主义来压制另一种不断追求的人道主义,这是人性观上的独裁,是洞穴假相的突出表现。

三、市场假相:缺乏反思的流行观念

“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语词。”^[5]17世纪的培根用市场假相来表明人们在语言交往中的误用和误解,揭露由此而造成的认识上的假相。21世纪的今天,市场假相还应包括被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流行观念等。大部分流行观念是大众传媒的制造者按照世人的趣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工而成,其中包括对高科技的流行见解。利用科技成果来谴责科技已成为消费社会的一大景观,当各种认识假相像棉絮一样充塞着人们的大脑,代替了人们的思维,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信息的奴隶。而且网络上大量的虚假信息会使人们的求真精神和理性思考能力受到损害,“铺天盖地的信息压迫,让人们的识辨能力和专注力大大降低”,^{[6]10}结果是市场假相更加畅通无阻。

对待高科技的市场假相不仅在大众中流行,而且也在学术界市场上占据一定份额。对于数字化的前景,人们担忧的是:“当人的大脑可以和计算机终端连接起来,人的思维、记忆和意识可以被复制、拷贝的时候”,^{[6]12}人还是人吗?人的自我在哪里?对于数字化的现实,人们忧虑的是:“随着数字化编码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各种各样的卡号、密码等数字代码成为人各种身份的象征,人由此对数码产生极强的依赖性,人的鲜活的个性也被淹没在数码的海洋里。”^{[6]12}此外,还有数字鸿沟和数字化战争等问题。“据联合国秘书处统计,全球收入最高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因特网用户的93%。而全球收入最低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因特网用户的0.2%。全世界大量的贫困人口还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福音。”^{[6]11}就像数字化技术应用于生产能使生产力以几何基数猛增一样,数字化技术应用于战争,极大地提高了打击精度和战争破坏力、杀伤力(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利用高技术优势,仅30多天的空中袭击就使伊军伤亡约10万人,17.5万人被俘)。这种人工防御体系所无法抗拒的强大破坏力,决不亚于核战争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的威胁”。^[7]

市场假相与种族假相、洞穴假相是一脉相承的,实质上,它是种族假相和洞穴假相在大众中的普遍化,并因为语言的特殊作用而增加了辨识的难度。市场假相的突出特点是,它触及到一些现实问题,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不全面而陷入主观性的误区。市场假相除了表现为对数字化的理解外,还表现在对高科技影响就业的谴责上。从现象上看,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了用工数量,造成下岗、转岗、失业人口的增加,从而加大了社会就业压力。此外,网络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广泛

重视。

市场假相是在语言的运用中产生的,语言具有将殊相转化为共相的功能。人们在运用语言的同时,也被语言所制约甚至蒙蔽。高科技观的市场假相主要表现为:

从不加反思的“人”的概念出发来质问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是种族假相和洞穴假相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表现形式进一步通过语言,借助媒体报道、学术研究被不断地重复和强化。“人还是人吗?”“人的自我在哪里?”这类问题表面上发人深省,实际上它是个假问题,它忽略了时间的存在。换言之,现实的人与未来的人并不是同一个,当人的思维、记忆和意识可以被拷贝时,已经没有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同的人来忧虑这些问题了。

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高科技带来的问题。市场假相的最大问题是顾此失彼,媒体常常是通过炒作来吸引受众的,学者往往也只有站在人性化的立场才能被认同。市场假相中虽然也有些一分为二的分析,但最后的落脚点大多仍然是简单的人文诉求,而不是肯定高科技的正向意义。其实,数字化编码淹没了人的个性,但也为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数字鸿沟加大了贫富差距,但也为彻底解决贫富差距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数字化战争加大了战争的破坏力,但也使打击目标更加精确、战争手段更加文明;智能化程度的提高使就业人口减少,但也使人的空闲时间增多,为人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创造了条件;网络生活使人的自我认知发生错位,但也为人的主体性开拓了生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的存在价值。

忽略了高科技实践的优越性。如果着眼于人的意愿,任何新的实践都是有利有弊的,然而有弊端的新实践仍然优越于旧实践。因为旧实践只能存在于一时,长期停留于旧实践会导致一个封闭的时空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系统的增熵,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为市场假相所完全忽略的。赫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每当历史上出现新的实践形式时,人们都会变得狐疑不决,往往会做出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反应。“人们往往比较满意前苏联和拉美壁画上汗流成河地在土地上耕种或操作机器的劳动者形象,而不是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中处理所有权凭证、股份和债券的资本家。”^[8]流汗的劳动者形象并非历史进步的象征,但容易被某些人文观念所美化。市场假相以流行观念现身,人们受流行观念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往又使某些观念得到巩固和加强。其结果是,市场假相大行其道,成为实践的阻碍。

四、剧场假相:难以突破的旧哲学

世界并非直接呈现在人的面前,人以哲学(概念)为中介把握世界。哲学理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在某一时间合理的哲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失去其合理性,变成阻碍实践的形而上学。根据柏拉图的比喻,人是被锁在山洞里的囚徒,背对着洞口,他所了解的全部世界只是投射在前面墙壁上的阴影。这个比喻说明,对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许多事情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的理念在其哲学根底上可能是陈旧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陈旧而错误的观念就是剧场假相。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基础,剧场假相是由人们对哲学体系的盲目认同造成的。之所以盲目认同,又与人类及个体的局限性、语言的局限性息息相关。事实上,剧场假相与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互为因果、互生共存。

黑格尔曾指出人类概念思维有三个主要缺点:一是抽象性,经常不得不舍弃掉了具体去追求一般,用“理想状态”下的逻辑将现实的过程加以简化;另一个是隔离性,在事物本身那里浑然一体的各个方面、各种性质,在逻辑思维上却不得不将其分隔开来;第三个缺点就是凝固性,被抽象、被隔离的概念要界定清楚,内涵就要稳定,而内涵一旦稳定以后,它就容易凝固起来。概念思维的固有缺陷使得剧场假相难以避免。当旧的哲学理论已经不再合理、新的哲学理论尚未诞生之际,剧场假相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对新事物、新现象的排斥与不解。20世纪以来,一方面是有限的、常规的、传统的概念思维仍然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剧场假相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从相对论、非欧几何学、量子论等“老三论”出来以后,科技上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层

出不穷,它们所揭示的世界已经逐渐为人类的传统思维越来越不能理解和想象了。前沿科学家与生活在剧场假相中的大众在思想观念上更是格格不入。

剧场假相在高科技观上的突出表现莫过于“科技异化论”。“科技异化论”其实并非高科技时代所独有,法国近代思想家卢梭就对科技异化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一切科技进步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进步,而实际上是将人类引向没落。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文领域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也随之加剧。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科技异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现代技术是异化人的力量;哈贝马斯认为,科技是一切社会异化问题的罪魁祸首。埃吕尔认为,现代异化有三个历史阶段,如果说18世纪异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的,19世纪异化的基本形式是经济的,那么“20世纪异化的基本形式主要不是经济的而是技术的,是技术增长和传播的结果”。^[9]在大多数人文学者看来,“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工具和机器的出现是对人的体力的部分取代,但工具和机器是受人操纵的,人对机器有主动权和控制权。”^{[6]12}而电脑对人的脑力的取代却有了质的不同。“当机器运转全面取代人的躯体活动、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脑智能的时候,人对技术的依赖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越来越面对着‘机器是人’的挑战,人对高度发达的虚拟世界会出现失控的现象。”^{[6]12}这样一来,人虽然摆脱了工业时代机器的束缚,但又日益沦为电脑、知识、信息、高科技的奴隶^[10]。总之,科学技术使人彻底异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高科技的负面影响已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劳动重负等等,而是更多地转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人的本质及其异化、人的崇高地位与神圣性、人的自由、人间的平等以及人类的安全或潜在的威胁等问题”。^[11]

迄今为止,以弘扬“人文精神”为宗旨的“科技异化论”很少受到质疑,说“科技异化论”是剧场假相更让人难以理解。无论如何,科技异化论者及其认同者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所谓异化是相对于非异化而言的,科技异化论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之上:存在着一个本真的、人的非异化状态。这里的问题是:哪一个历史时期、哪种人生模式是人的本真状态?历史从来没有静止状态,人与人性也都不是抽象的。在黑格尔那里,异化与对象化是同一的。只要有对象化活动,就会有异化。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将人置于具体的历史中来考察。人只要不是像动物一样简单地再现自身的生命,其实践只要是物的约束下的对象化活动,他就必然要遭遇“异化”,异化通过物而传递到人。马克思明言,人只有经过异化,才能摆脱异化。

其次,“异化”与“非异化”不仅是事实判断,而且是价值和理想判断。“非异化”是人对自身生存的理想化期盼,这无可厚非,问题是:所谓非异化的期盼来源于何处?是人的肉体吗?如果人与动物、植物一样,不存在异化与否的问题,是精神使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显然,非异化的期盼来源于人的精神。对于精神而言,又有两种情况需要分析:其一,肉体本身就是精神的异化存在,从这个角度看,高科技的“去肉体化”正是精神的内在要求;其二,肉体虽然束缚了精神,但因为充当了精神的载体,也就获得了与精神一样的永恒性和神圣性。但请注意,这里埋伏着形而上学的地雷。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原则上总是思考着 homo animalis [动物的人],即使 anima [灵魂]被设定为 animus sive mens [精神或思想],而精神或思想后来又被设定为主体、人格、精神。这样一种设定(Setzen)乃是形而上学的方式。但这样一来,人之本质就太少受到关注,并且人之来源的本质就还没有得到思考”。^[12]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联系起来思考哲学问题,人的本质在他看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精神及其肉体载体;相反,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从来源上看,他是时间的产物,从存在形式上看,他是时间中的变动物,但是形而上学使这两点被忽略了。在某种程度上,形而上学正是把肉体永恒化与神圣化的产物。

高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动摇了天经地义的人性假定,使人的自我认同面临危机,也使人类认识的窘境暴露出来。可以说,高科技这面镜子照出了人在认知上的天然局限性,也照出了目前作为人文基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哲学缺陷。辩证地看,人类既要谨慎地发展高科技,也要反省自身认识的局限

性。可以说,高科技以否定的方式证明人的本质、人性不是永恒的,同时它也以否定的方式证明人类思想存在着局限性,哲学研究的整体范式亟待突破。此外,高科技对人文精神的挑战也预示着一个有别于目前的存在图景。“冲突仅是一种朕兆,它说明了还有更宽广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在那里,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微的科学将互相调和起来。”^[13]

参考文献:

- [1]刘海龙.人类克隆:技术与伦理的互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2.
- [2][澳]保尔·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M].傅承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
- [3][法]安·兰德.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M].万里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68.
- [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40.
- [6]陈志良,高鸿.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悖论之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04(2).
- [7]高鸿.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4):5.
- [8][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王晓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46.
- [9] ELLUL J. The betrayal of the West[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8:136.
- [10]陈志良,高鸿.数字化时代与人文精神[J].理论学刊,2003(3):32.
- [11]肖峰.高技术时代的人文忧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
- [12][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79.
- [13][英]A. N.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76.

Idols and the True Meaning——Mirror Im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Human Thoughts

CHEN Huip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problems caused by high-tech reveal both man's natural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the philosophical imperfections of world view and values—the foundation of humanities, which calls for a breakthrough in the entire paradigm of philosophical study. With Bacon's exposition of “idols”, we could see clearly the deep-rooted anthropocentrism, the “unconscious” subjective metaphysics, lack of reflection in the popular views, the bottleneck of conventional philosophy, etc. existing in the views on hi-tech. In a way, the high-tech field c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philosophical innovation as the frontier issues genera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mean an opportunity of thought renewal.

Key words: high-tech; idols of the tribe; idols of the den; idols of the marketplace; idols of the theatre

(责任编辑:江 雯)